

儒家与市场秩序可以兼容

■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毛寿龙

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的研究发现,儒家文化过于强调家族对个人的保障和救济,因此抑制了金融市场和福利政府的发展。他认为,半个世纪以来的技术进步,将让市场在几千年来第一次战胜儒家。

陈教授认为,儒家思想实际上内含着一个资源配置方案。它意味着资源按照等级身份来分配,主张非货币化的方式来配置社会资源。而市场经济,则按照货币化的方式,按照价格原理来配置资源,谁出价最高,就配置给谁。

陈教授认为,历史上,中国有过几次关于市场化发展时期的文化讨论。战国时期曾有利义之争,南宋和清朝中晚期的市场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思想界也同时开始义利之辩。中国最近30多年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又一次开始了文化讨论。历史上义利之争,儒家都获得了胜利,而市场经济发展受到了挫折,但这一次市场经济将战胜儒家。

陈教授在与新儒家的探讨中,认为新儒家想要恢复儒家的王道和三纲五常秩序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今交通技术很发达,手机以及互联网均得到了普及、就业遍及五湖四海,家庭和家族以及亲情网络的作用越来越小。在未来中国,家庭的养老模式,势必被政府和金融市场的货币化养老模式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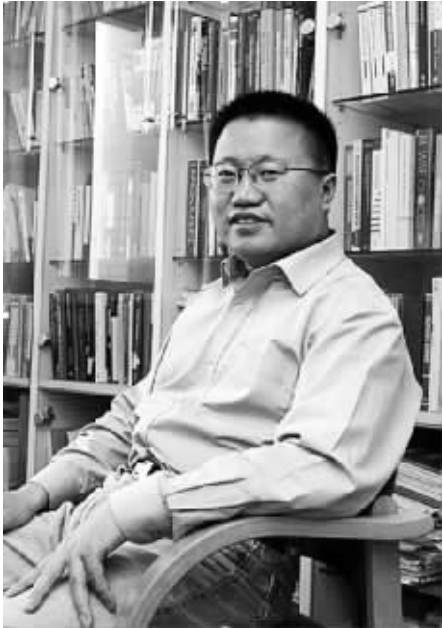
笔者认为,陈教授很重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但忽略家庭和家族,尤其是亲情网络的作用,这很不符合现实的。尤其是义利之辩,的确义压倒了利,但在市场经济时代,利是不是就一定会压倒义,或者是不是一定要利压倒义,市场经济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这就很值得怀疑。

因为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只是一种高度扩张的秩序,或者说是一种高度扩张的形式化的秩序。这种秩序,的确是扁平化的,而且是高度货币化的,也就是具有高度流动性,它大大解放了人的身份束缚,从而大大增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进而让个人的市场价值得到了

巨大提升。它不仅可以让人的远期价值得到实现,如通过金融杠杆来贷款买房,从而不依靠父母的积蓄来买房,而且还可以通过今天的储蓄来为自己的老年筹款。这些都是金融市场的作用,它让资源可以在时间维度得以扩展。当然,从空间来说,因为存在金融市场,人可以随时把本地的资产处置并更换成货币资产,然后迁移到任意的地方去工作,然后再购买新的资产。金融市场让任何传统上无法移动的不动产变成了可以移动的货币资产,这就在空间上让人摆脱了原有家庭和家族的束缚。“拼爹”在本地很重要,但离开了本地,在遥远的他乡,更多的是拼自己的才能。

在这个意义上,陈志武教授是正确的。但我认为,陈志武教授不正确的一点是,人虽然是流动的,但人不可能永远处于流动的状态中,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再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永远处于旅游的状态。金融市场自身依然有风险,在货币价值无法得到稳定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尤其是当经济不处于长期稳态反而出现了线性增长的情况下,现在的储蓄实际上很难支撑未来的养老。而金融市场的发达,往往导致房地产价格高昂,这让父辈以较低的价格购得住房,而下一代却很难一开始就能够承受高额的房贷压力。

前一个问题,陈志武教授认为可以通过政府的养老保障计划,也就是现收现付的方式,让这一代人养活上一代人。但未来的下一代人能否养活现在的这一代人,还是一个未知数,很多模型已经推导出,很多国家的现收现付养老模式总有破产的一天,而不得不让退休年龄大幅度延迟,才能让养老计划得以延续,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实施补充性的个人账户方法。这说明,金融市场和政府,虽然能够替代家庭和家族,但在其自身不够保险的情况下,家庭和家族,尤其是社会自身的力量,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儒家不仅不与市场经济冲突,反而在君子不器、天下为公的公共治理结构层次,支撑传统国家秩序的治道变革。

更何况,金融市场自身只能提供货币化的养老模式,货币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很多东西,住房服务、养老服务等等。但是,住房服务并非纯粹扩展秩序的宾馆式服务,它是较为长期的居住和生活,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家庭和社区的形式出现的。在此情况下,家庭和社区服务,依然是非常关键的,而这些服务,虽然和市场有关系,但它和纯粹扩展的市场不同,是一种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市场服务,而很多家庭服务,是市场服务根本无法替代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养老模式,其中一种就

是家庭和社区养老模式。市场化的照料固然很重要,但家庭式的照料,是很多市场服务所不可替代的。而在社区资源、家庭资源的配置方面,儒家的价值依然非常重要,尊老爱幼,长者先吃,长者先行,子女要孝顺,这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依照传统儒家原则运作的家庭和家族,包括亲情网络,在其年老时候所享受的福气,显然要大于那些完全按照市场原则运作的个人。

从秩序角度来说,人是群居的动物。群居,就需要有秩序。从时间维度来说,人类的秩序有原始人的秩序,后来有国家的秩序,到现代社会发展了市场秩序。从原始的秩序到国家的秩序,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上的帝国创造了主要的古代文明。从原始秩序、国家秩序到现代扩展至全球的市场秩序,它创造了现代文明。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秩序替代原始秩序、国家秩序,是人类的进步。但从空间维度来说,现代人基本上生活在原始秩序、国家秩序和市场经济中。这三种秩序不仅决定了个人生活和现代的空间,更决定了现代社会、现代经济和现代国家的成败与否。这些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原始秩序、国家秩序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公共治理是否进步。单方面的市场秩序的发展,需要有相应的国家秩序的进步,也需要有充分发达的家庭、家族和亲情网络构成的原始秩序。

实际上发达国家到处存在家族企业,而社会治理的进步,同样是市场经济不可忽略的力量。即使是上市公司,股权高度流动化,经理人团队也有相当的流动性,但一个企业一旦有了历史,就有其独特的企业文化,也就是其内在具有原始秩序的特性,而且其身份等级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更何况金融秩序本身需要强大的信用资源,而原始秩序恰恰可以提供强大的信用资源。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高度扩展的主观的经

济,它的基础是一大批企业家,一大批成熟的消费者和投资者,一大批管理者和专业人士。这些群体自身都具有很大很强的且具有很大的个性化差异的主观价值。他们很多都是世传的,如音乐家家庭多产音乐家,企业家家庭多产企业家,但即使不需要世传,也需要有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支撑。而在专业共同体中,这些人实际上依然是有身份等级的。陈教授在金融家队伍里,就有其自身的等级。而正是这个等级,让陈教授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

所以,从秩序的维度来看,在历史上,空间上,原始的秩序、国家的秩序和市场的秩序,的确有过冲突,并且与其相关的很多思想也会出现冲突,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市场秩序一直处于这场战争的下风。在西方,这一格局自亚当·斯密开始有了改观。在中国,则是始自改革开放,而且即使在现在,让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依然是努力的方向。

当前,市场秩序的价值已经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但市场秩序依然需要原始秩序和国家秩序的支撑。在这个方面,关键是让各个秩序得到充分的让渡,从而给人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与此同时,让这些秩序也能够得到充分的兼容。

因此,国家需要实现治道变革,从统治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原始秩序也要实现其内在治理结构的变化,从传统封闭的家庭和家族发展到具有自由开放的权利结构的公共治理结构。至于市场秩序,则更多的是一个扩展的抽象规则下的秩序,这一秩序同样兼容家庭、家族,同样兼容传统社会,同样兼容亲情网络。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公天下”的结构,这就是中国儒家所说的,大同社会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不仅不与市场经济冲突,反而在君子不器、天下为公的公共治理结构层次,支撑传统国家秩序和公共秩序得到了实质性的转型,从传统家族和国家治理思想资源,变成了现代公共治理的思想资源。

全球化是否减少了不平等?

■ FT 首席经济评论员 沃尔夫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写出了一本杰出的著作。《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方法》(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是一本信息量大、涉及面广、学术性强、富有想象力并且极其简洁的书。米拉诺维奇在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以及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çois Bourguignon)近年重要著作的基础上又取得了重大成果,完全符合你在这个领域中一个世界顶尖专家的想象。

与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4年出版)不同,米拉诺维奇更关注全球不平等,而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更关注收入的不平等,而不是财富的不平等。他所展开的画布比阿特金森所著《不平等:我们能做些什么?》(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 2015年出版)一书更加广阔,后者集中讨论了英国一个国家的状况,也更为深入地探讨了政策领域。与《全球不平等》最接近的是布吉尼翁所著的《不平等的全球化》(The Globalisation of Inequality, 2015年出版),这或许不足为奇,因为两位作者曾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共事。但米拉诺维奇的论述更加偏向历史和政治角度。

米拉诺维奇和布吉尼翁一样,强调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事实。虽然大多数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特别是高收入国家——都在加剧,但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尽管严重)呈持续下降趋势,自2000年以来尤为明显。不过一旦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升至全球平均值以上——这很快就会发生——全球收入不平等下降的趋势可能将不再持续。全球不平等能否进一步下降的前景将取决于其他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印度——的发展速度。

米拉诺维奇的其他结论则比较令人不安。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生于1901年,卒于1985年)提出过一个影响很大的假说,即经济发展首先会导致一国内部的不平等下降,随后才会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收入之逐渐加剧。该假说已被一系列事实证伪。不同于上述“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米拉诺维奇提出了“库兹涅茨波浪”(Kuznets waves)的概念:不平等程度会先上升,后下降,然后再上升,并且可能永不停止的如此波动。

米拉诺维奇目前是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Luxembourg Income Study Center)纽约办公室的高级学者。他因编制过一张图表而声名大噪,该图表展示了1988年至2008年间全球收入分布的各阶层实际人均收入按比例上升的状况。在《全球不平等》一书中,这张图表的数据被更新至2011年。处于全球收入分布最底层的人群收入增幅相对较小,而全球中产阶级的收入增幅则颇为可观:1988至2011年间,位于全球第45至第65百分位数(从低到高排

米拉诺维奇在《全球不平等》一书中指出,全球化使世界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下降,但使大多数国家内部、尤其是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加剧。危险在于: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似乎很难和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共同存在。



列)之间群体的实际收入增长了一倍。该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中国人。但处于第80至第95百分位数之间的群体遭遇了实际收入停滞不前的困境。这部分人主要是高收入国家的中产阶级。

最后,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比收入紧随其后的其他群体要好得多,其实际收入增长了约40%。这个群体的范围远比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前1%人群更广:在美国收入排名前12%的那部分人,以及英国收入前5%的群体,都属于全球收入最高的那1%。而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获得了全世界约29%的收入,他们占有全世界约46%的财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总是高于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很多时间里,当今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速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平。在此期间,一个人在全球收入分布中所处的位置与他做什么事的关系越来越小,而越来越取决于他在哪里做这种事。米拉诺维奇将这种作为一个英国人而非肯尼亚人的优势称为是“公民身份租”(citizenship rent)。近些年来,这种租金有所下降,但降幅很小。目前一个人的生活水准受他做什么事的影响略有上升,受他在哪里做这种事的影响略有下降。

因此,当前的整体情况是,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程度小幅下降,而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趋于上升,这在高收入国家尤为显著。鉴于大部分政治活动都属于国内政治领域,国家内部不平等加剧的时期不可避免会产生政治影响。米拉诺维奇特别指出,“极度的不平等终将变得难以维系。”

这可以部分解释高收入国家内部在最近不平等加剧之前出现的不平等下降时期。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高收入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不仅受益于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受惠于这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自十九世纪的极高水平显著下降。

推动二十世纪中期这轮不平等下降的不仅有良性因素——如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还有恶性因素——如战争和经济萧条。米拉诺维奇强调称,这些恶性因素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极度不平等的后果。不平等的社会容易产生好战倾向;世界大战就是其产物。类似的是,不

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金融市场发展天生就有易于爆发危机的倾向。

而最近这一轮发生在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的不平等加剧同样也有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的原因与后果。全球化、科技进步、金融重要性的上升以及赢家通吃型市场的出现是经济层面上的推动力量。富豪政治(Plutocracy)随之出现,并进一步强化了不平等的恶化趋势。例如来自美国的证据显示,政客会惯常性地忽略中低收入群体的诉求。

米拉诺维奇认为,推动几乎所有经济体内

部不平等加剧的各种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发生逆转。在这一点上,他对中国比对美国要略微乐观一些。随着中国劳动力增长的放缓,实际工资开始强劲上涨。此外,来自下面的政治压力以及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的必要性或许会促使中国政府将收入分配向中层和底层民众倾斜。

对于美国以及其他高收入国家来说,不平等加剧背后的推动力量非常强大。二十世纪中期的再分配政策现在将难以推行,因为对灵活流动的资本和人员征税的难度加大。如果说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的良性因素目前显得虚弱,那么恶性因素现在又该如何?在高收入国家中,他们不光正在见证财富的积累,还在见证民粹主义的大行其道。毫无疑问,这两者是齐头并进的。我们目前尚不知道这种局面将如何收场。米拉诺维奇甚至提出了民主资本主义能否持续下去的问题。

如果全球化正在使世界变得更加平等、使大多数国家内部——特别是高收入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加剧,我们是否应将全球化看成一种有益的发展趋势?米拉诺维奇更偏向全球范围的评判尺度:如果全世界的中低收入

阶层过得更好,那么全球化就是有益的。与此同时,他对高收入国家内部正在发生的情况感到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在政治层面或许是不可持续的。这种观点尤其适用于移民问题以及资本自由迁移可能会被看作是货物、服务以及资产的自由流动的结果是激起对全球化的抵制。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以及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大受欢迎表明,高收入国家的中低阶层将为保护自己的公民身份租而努力抗争。

全球化时代产生了有益的结果,但同时也制造了巨大的挑战。若想避免各国内部的不平等持续加剧,对来自资本或者财富的收入进行再分配或将成为解决办法中无法避开的一个方面。而这在政治上是否可行呢?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未来的政治前景略显暗淡。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似乎很难和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共同存在。米拉诺维奇的著作既展现了过去数十年间全球范围内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将这些危险如此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滴滴并购优步中国是否构成垄断?

■ 何姗姗 王新锐

—— [上接 02 版] ——

对网约车“相关市场”的界定是否过于狭窄?

根据欧美的经验,区分某种业务是否为互联网独有,是界定互联网行业反垄断案件相关市场的基本思路。当互联网企业开展的业务专属于互联网时(比如社交网络服务网站),相关市场的既定更倾向于局限在互联网内。但是,当一种业务非互联网所独有时,互联网市场和实体市场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竞争。当互联网行业仅仅为传统商品和服务的推送提供了一种新的渠道和方法时,不应轻易认定其是一个独立于传统市场的相应市场。

滴滴和优步针对传统出租车行业,是不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渠道和方法?今年7月28日七部委联合出台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似乎体现了这样的思路。网约车服务要三证齐全且开具出租汽车发票,经营者需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网约车车辆需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驾驶员则需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驾驶员证》。三证都要向地方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在其审核后颁发。行政机关似乎把网约车当成传统出租车行业的补充,在市场准入上采用了相同的行政许可模式。换句话说,网约车的出现有可能已经拓宽了“出租车”的外延。

另外,互联网企业不同于传统的单边市场,而具有双边市场特性,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交易。比如淘宝或京东就是典型的双边交易平台(“two-sided platform”),店家和客户在其平台上买卖商品。双边平台盈利能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交易平台的用户数量,因此常常出现在发展初期大量靠免费和补贴来吸引用户的情况。网约车平台似乎也符合双边市场的特点,其早期大量“烧钱”的行为就是在争夺司机和乘客的加盟,培养司机业务模式的同时也培养乘客的出行喜好和生活方式,从而久而久之形成锁定效应。不难想象,有些出租车司机可能会放弃原有工作而加盟网约车专车司机,而大众也会越来越习惯于网约车平台所带来的出行便利。同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在定义“网约车经营服务”时也体现

了双向性:“网约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网约车平台位于司机和乘客之间,整合信息为双方牵线搭桥促成交易。

互联网是反垄断执法的新领域,同时也是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网约车平台都是一个。对于各国反垄断执法机关而言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它极有可能颠覆了对相关市场的传统界定。针对滴滴并购优步,虽然普通民众的第一印象是该联盟导致其在网络预定专车领域占据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但是对于相关市场的界定是否应该如此狭窄?它与传统的实体行业是否存在竞争?这些问题都给国内外外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和反垄断从业者们提出了共同的挑战。这也意味着在确定相关市场时,需要对互联网企业以及用户等主体充分调研,并了解不同业务之间的竞争关系,在此基础上从“替代性”入手并结合互联网企业的特性来分析。当标准尚不明确,判断无把握的情况下,避免因对相关市场过窄的界定而伤害了创新和效率。